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6冊

明代的江南藏書
—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

陳冠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陳冠至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民95）

目 2+384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第 6 冊）

ISBN：978-986-7128-44-7（精裝）

ISBN：986-7128-44-3（精裝）

1. 私家藏書—中國—明（1368-1644）

029.76

95015437

ISBN 986712844-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 第六冊

ISBN：978-986-7128-44-7

ISBN：986-7128-44-3

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

作 者 陳冠至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6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代的江南藏書
—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

陳冠至 著

作者簡介

陳冠至，西元一九六九年生，台北市人。一九九六年，獲私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文學士學位。一九九九年，續獲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文學碩士學位。二〇〇六年，再獲本所文學博士學位。主修明代史，學術專長為明史、中國藏書史、歷史文獻學、古籍整理學、地域文人集團與私人藏書文化等主題。曾任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共同科兼任講師，現致力於古代生活文化史研究。

陳君碩士、博士階段，十年間專攻明代文人藏書生活文化，對於史料的掌握與應用，頗有心得。除探討傳統圖書文物與中國史部目錄學外，並創新研究取向，結合社會史學，另闢明代文風鼎盛，藏書活動、藏書生活極為多姿多采的江南六府地區（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為研究議題。其中涉及文人活動、生活方式、文會結社、藏書專題、圖書流通與文化傳播、圖書鑑賞等等，研究領域至為寬廣。著作有《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探索明代蘇州文人藏書生活的型態與文化；而《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一書，乃前書之展延，將地域範圍擴充至明代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等五府地區，繼續探究本區的私人藏書事業與文化風尚。此外，尚有〈明代的巡茶御史〉（刊載於《明史研究專刊》，第14期，2003年8月）、〈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刊載於《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4期，2006年夏季號）等學術性論文若干篇。

提 要

中國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富含著極其燦爛的古代文明。中國古代典籍之多，也居於世界之首。私人藏書活動正是人類文化經過長期的演進以後，才產生出的一種具有高度文明的文化事業，並且融入社會上的知識階級以及部份工商階層的生活當中，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探究中國文化史時，私家藏書的歷史，自然也是其中一門非常重要的課題。

明代的江南五府地區，包括南直隸的松江府、常州府，以及浙江的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等圍繞太湖沿岸的地域範圍。江南五府在明代，由於經濟條件較佳、商業貿易的高度發達，以及學術與文化的勃興等各種因素的交相影響之下，藏書事業呈現空前的熱絡與發展，並進而在文人生活領域當中，成為一種主要的生活文化。此外，藏書家因為志同道合，透過各種社會關係進而織成的集團網絡，更加突顯出明代江南五府藏書事業的時代流行面貌。凡此種種，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史研究之上，都是一些相當有趣而值得從事研究的命題。

由於對明代私家藏書文化的高度興趣，經過多年的思考與資料的收集，透過一邊整理與一邊閱讀的方式，對於明代江南地區的藏書文化以及文人生活型態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並且興趣又更加的濃厚。遂以《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為題，進行時代性與區域性的文人藏書文化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江南五府的藏書家	13
第一節 松江府	14
第二節 常州府	25
第三節 杭州府	34
第四節 嘉興府	44
第五節 湖州府	57
第三章 江南五府藏書家的特質	63
第一節 收藏內容	63
第二節 收藏心態	75
第三節 勤勉好學	83
第四節 仕途多舛	88
第五節 尚古隱逸	96
第六節 經濟無虞	109
第四章 江南五府藏書家的集團性分析	121
第一節 地緣關係	122
第二節 家族關係	127
第三節 姻親關係	132
第四節 師承關係	136
第五節 友朋關係	140
第五章 江南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	159
第一節 藏書徵集	159

第二節 藏書管理	192
第三節 藏書整治	209
第四節 藏書賞鑒	218
第五節 藏書流通	229
第六節 藏書散佚	238
第六章 江南五府藏書家的藏書生活	245
第一節 讀書生活	245
第二節 著述生活	253
第三節 文會過從	260
第四節 生活舉隅	279
第七章 結 論	289
附圖：	
圖一：明代江南五府轄境圖	12
圖二：朱察卿等四家姻親關係示意圖	134
圖三：沈啓原等五家姻親關係示意圖	135
圖四：李日華等四家姻親關係示意圖	136
圖五：朱祚等四人師承關係示意圖	138
圖六：唐順之等四人師承關係示意圖	139
圖七：馮夢禎等四人師承關係示意圖	140
圖八：唐順之集團成員交往示意圖	141
圖九：徐獻忠等集團成員交往示意圖	145
圖十：曹溶集團成員交往示意圖	155
附表：	
表一：江南五府所屬州縣藏書家人數排名表	124
表二：江南五府藏書家族分佈狀況表	132
附錄：	
附錄一：江南五府藏書家知見表	295
附錄二：江南五府藏書家功名與仕途表	313
附錄三：江南五府藏書家家世與職業表	325
附錄四：江南五府藏書家地域分布狀況表	339
附錄五：江南五府地區藏書樓表	349
徵引書目	355

第一章 緒 論

題旨的緣起

自從西周末期王官之學衰落，士人階層的傳統貴族地位淪喪，他們爲了生存與理想，於是懷著一己之所學，求售於春秋與戰國的諸列侯之間，並以一身的學問傳授生徒，造成學術上諸子百家之學的勃興局面。於此同時，爲了便於知識的累積與管理，私人收藏書籍的風氣也於焉而起。一般而言，藏書是指典籍圖書的收藏活動，然其間亦有區別。在歷史中國，藏書特指皇室、私家、寺觀、書院等的典籍圖書的收藏。其概念往往不僅僅是專指藏書一事而已，還包括與之有關的購置、鑒別、校勘、裝治、典藏、鈔補、傳錄、刊布、題跋、用印、保護等等一系列的活動。^{〔註1〕}由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書籍的民族，故歷史上文獻家輩出，代不乏人。因此，士人在聚書、抄書、校書、刻書、輯書、編目、題識等活動，便成爲幾千年來中國文壇上重要歷史活動內容。^{〔註2〕}而與藏書相關的課題研究，也成爲近代以來有志從事中國傳統典籍與文獻之愛好者的主要研究對象，所以，藏書史的研究，遂因而發揚光大。

中國古代藏書活動的發生，自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而中國古代藏書事業之所以成爲一門專學，也有其一定的歷史進步過程。大致在中國明代以前，藏書之學只有藏書實踐（指藏書活動）和藏書思想（指藏書理論）的發展研究，到了明代以後，才有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理論總結，並且對後來的藏書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註3〕}

〔註1〕王余光，《藏書四記》（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第一版），頁三三三。

〔註2〕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頁一。

〔註3〕徐雁，〈我國古代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歷史總結〉（《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頁五六。

所謂藏書史，是指不同時代的圖書典籍，依照確定的編排體系，從而實施管理、保存與流通的歷史。^{〔註4〕}這裡面涵蓋的層面很廣，其中包含著許多藏書領域的專門學問，以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專題研究等。藏書是爲了閱讀、保存、鑒賞、研究和利用等目的而進行的收集、整理、典藏圖書的活動，包含了私人與公家、寺觀、書院等，都是人類社會文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做爲一項文化事業，藏書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而藏書做爲一種文化生活的表現，它也可以是時代精神風尚的反映。至於若以個人行爲的表現上來看，它其實也是人們綜合素質的體現。^{〔註5〕}而在中國藏書史的研究過程當中，又以私家藏書史是百年來學者們選題的重點所在。^{〔註6〕}因爲私家藏書是中國古代圖書館事業的主流，不論從藏書家數量、藏書數量，還是從社會作用和影響來看，私家藏書都遠遠超過了公家藏書、書院藏書和寺廟藏書。^{〔註7〕}私家藏書研究在中國藏書史上，佔有最爲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對於明清時代而言，更是如此。

中國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富含著極其燦爛的古代文明。中國古代典籍之多，也居於世界之首。而中國古代的藏書，是華夏文化的驕子，也是中華文明賴以存在和流傳的基本因素。與世界上任何一種古代和中世紀文明中的文獻收藏相比，中國古代的藏書均毫不遜色。^{〔註8〕}至於圖書，它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也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反映和沉澱。^{〔註9〕}加上書籍的編纂乃是爲一種文化的積累，既是崇儒右文的體現，又能起到宣傳教化的作用。^{〔註10〕}此外，在文化傳播的範疇之內，書籍不僅對於時代的橫切面起著流通人類知識與文化的作用，在時間的縱剖面上，也是人類知識與文化賴以傳承散播的主要介面。明人有云：「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集之傳焉。」^{〔註11〕}也就是

〔註4〕焦樹安，《中國古代藏書史話》（《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六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年八月初版二刷），頁一。

〔註5〕黃顯功等，《現代家庭藏書文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七月第一版），頁一。

〔註6〕徐雁，〈八〇年代以來中國歷史藏書的研究成果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頁一〇。

〔註7〕劉意成，〈私人藏書與古籍保存〉（《圖書館雜誌》，一九八三年第三期），頁六〇。

〔註8〕吳晞，《從藏書樓到圖書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第一版），頁七。

〔註9〕石洪運等，《圖書收藏及鑒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頁三五。

〔註10〕陳寶良，〈明代皇帝與明代文化〉（《史學集刊》，一九九二年第三期），頁二一。

〔註11〕明·黃瑜，《雙槐歲鈔》（《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第一版），卷九，〈彭陸論韻〉，頁一七八。

說，中國歷史藏書事業是歷史社會文化產品積累、保藏、整序、傳播和創造的重要系統，對中國文化史有著特殊的貢獻。中國歷史上的藏書事業，是世界史上起源最早，最有系統，並且最為發達的文化事業之一，而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註12〕所以，研究中國的藏書史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打開中國文明寶庫的一把鑰匙，因而有著重要意義。〔註13〕

近年來，從文化學角度考察與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藏書活動而形成的藏書文化，已經成為學術界的熱點。〔註14〕中國的私家藏書為世界之最，它不僅對中國文化史有其特殊的貢獻，而且也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相應的位置。〔註15〕由於藏書是有關圖書收集、保存與典藏、研究、流傳、散佚等活動的總稱。所以，這一活動本身即具有文化性，同時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關係最為密切。藏書文化研究的重點便是藏書活動本身、藏書活動有關的各種行為或現象、它與當時社會環境的關係，以及它對社會文化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等方面。〔註16〕而私家藏書活動正是人類文化經過長期的演進以後，才產生出的一種具有高度文明的文化事業，並且融入了社會上的知識階級以及部份工商階層的生活當中，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所以在研究中國文化史時，私家藏書的歷史，自然也是其中一門非常重要的課題。此外，藏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為文化學、文化史的研究所借鑒，甚至具有更直接的意義。簡而言之，研究中國古代藏書歷史發達與地域興盛的事實，將為文化學的研究提供強而有力的實證。〔註17〕而歷史上的私家藏書事業，是中國民族文化學術事業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對於這方面的研究，無疑在文化學術史上起著重要的意義。〔註18〕所以，要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現象種種特異之處，以及藏書家們思想行為的根源，就必須從「文化」這一層面上入手而加以剖析。私家藏書做為一種文化現象，而藏書家做為文化圈中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受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註19〕因此，藏書

〔註12〕王余光等，《中國讀書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版四刷），頁四四〇～四四一。

〔註13〕《中國古代藏書史話》，頁一。

〔註14〕劉尚恆，〈略論中國藏書文化〉（收入《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版），頁二三。

〔註15〕陳曙，〈論私家藏書〉（《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九二年第一期），頁六七。

〔註16〕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頁三。

〔註17〕徐雁，〈我國古代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歷史總結〉，頁六〇。

〔註18〕劉尚恆，〈「以傳布為藏，真能藏書者矣」——論我國古代私家藏書的流通〉（《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九一年第六期），頁七七。

〔註19〕張列軍，〈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現象的文化背景剖析〉（收入《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版），頁三九六。

和文化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兩者互為表裡。

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文化史的研究先是在歐洲，然後在美國，逐漸蔚然成風。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發展，一時也成為史學研究領域中的顯學，不論在理論和實際的研究上，都有豐碩的成果，並且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註20〕但是在中國文化史的發展上，則略顯稍晚。在一九八〇年代，劉子健已提出嚴厲批評，指出明代在文化史上研究上的不足，並且認為許多通史講到明代，都沒有很高的評價；而今日學人的相關論著，也並不多提明代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且中國歷史書，從遠古講到近古，似乎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代更加不行了。〔註21〕近十幾年來，在海內外明代學者與專家們的大力提倡之下，明代文化史才得以迎頭趕上，其空白之處也漸漸被填補了起來。然而，在藏書文化的發展上，卻仍然存在有很大的空間。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曾有學人呼籲學界，對於古代藏書家的研究，前人在史料考訂、輯佚上的確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發表了一些精闢獨到的見解。但是，那只是對藏書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並且在以往的研究中還存在許多缺陷和不足，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應吸收其精華，拋棄其舛誤。〔註22〕也就是說，必須對於以往的藏書研究做一番總檢驗，並且開發新的藏書專題研究領域。例如對於歷史出現的各類藏書家，應從他們的藏書在當時的地位，藏書的實際使用價值，以及對於後世文獻的保存作用等等方面來具體分析，只有這種探討才是有益的、科學的。〔註23〕當然，中國藏書的研究領域不僅止於此，還亟待各界從各種不同角度的觀點去細心考察，並且對於前人研究上的問題及錯誤，做出解決與改正的處理。

文化的特點便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特點，任何歷史現象都可以透過文化現象得到反映。從這一個意義上來看，明代的文化史也就正是一部明代史。一般來說，文人又往往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化主流，他們無法擺脫時代的局限，但同時又對社會的趨向起著引導作用。〔註24〕特別是明代文人思想之新穎，視野之開闊，興趣之廣泛，都是前古未有的。從他們的思維方式、知識結構以及行為特徵諸方面來加以探究，

〔註20〕李孝悌，〈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兼論中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八期，一九八九年九月），頁九五。

〔註21〕劉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價〉（《食貨月刊》，復刊第一五卷第九、一〇期，一九八六年四月），頁三七五。

〔註22〕楊柏榕等，〈關於中國古代藏書家評價問題〉（《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頁六四。

〔註23〕謝灼華，〈私藏的功績——中國封建社會藏書制度的歷史特點之二〉（《圖書情報知識》，一九八四年第四期），頁二五。

〔註24〕商傳，〈晚明文化商品化與社會縱慾思潮〉（《明史研究》，第四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頁二〇七。

明代中後期的文化可以概括為奇、新、博、變四大特質。(註25)他們的這四大特質，往往表現在生活上的諸多癖好之上，形成明代文人生活文化上的諸多特色。然而，明代文人階層這個具體存在的社會群體，往往反而在近代的研究當中消失不見，之前學人雖然在論述士、士族、文官、縉紳、士大夫等社會階級時都會涉及文人階層，但卻從來不曾將之視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當中一個獨立的單位或重要的等級區分。而相關研究之貧瘠，與這個階層的重要性相比，實在也不成比例。(註26)雖說社會史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較之以往，已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並且成為當前史學的主要潮流之一。(註27)但是，在文人階層的社會生活領域之內，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的確還有待學人的多加努力。因此，若要鼓勵學人們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文人階層，其實在歷史研究的領域內，文人集團生活文化史的研究正可填補社會學方面研究之不足，而藏書家既為文人集團中的成員，其研究價值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至於中國古代藏書事業，在中國文化史研究層面上的內涵為何？其實，中國藏書文化的內容極為豐富，包括了各種藏書機構和眾多藏書家等藏書活動的主體，以及典冊與圖書本身等藏書活動的客體，還有諸如圖書的收集、購求、鑒別、保藏、研究、散佚等藏書活動，也包含了與藏書活動關係密切的刻書、書肆等社會風尚，以及藏書風尚產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等等，(註28)都是中國藏書文化的研究內容。總體而論，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是一種內蘊極其豐富的文化現象，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來看，它既有汗牛充棟的圖書、巍然矗立的藏書樓等物態文化，又有在長期藏書活動當中形成的專業技術和風尚、習俗等行為文化，還包括有藏書家主體因素潛層的心態文化。如此豐厚的內容，決定了古代私家藏書必然成為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註29)誠如今日有些學者提出「中國圖書文化」、「中國近代圖書文化」等專有名詞，這些名稱的提出絕非偶然，它實質上反映了部份有識的專家學者對於國內外長期以來在研究中國圖書，尤其是中國圖書歷史的過程中過份注重對圖書的內在聯繫如文字、載體、製作技術、物質形態等的研究，而忽視對圖

(註25) 陳寶良，〈明代文化縱談〉(《光明日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三版。

(註26) 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五十週年校慶特刊，二〇〇〇年十月)，頁二七七。

(註27) 徐茂明，〈明清江南社會的生動畫卷〉(《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〇年第三期)，頁九六。

(註28) 《中國近代藏書文化》，頁五。

(註29)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四月第一版)，頁一。

書的外在聯繫如圖書與社會、文化等諸方面的相互聯繫等的研究之不足。〔註30〕

總之，研究中國歷史藏書，對於全面了解歷史社會的生活、完整認識文化學術史面貌、總結愛書讀書治學精神、光大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編撰中國藏書通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其近期的課題，包括有廣泛開展專題性的藏書研究、區域性藏書研究、中國歷史藏書資料索引或匯編的編集、編撰歷史藏書事業大事年表，以及編著中國藏書斷代研究和區域研究專著等目標。〔註31〕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私家藏書，對於全面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發揚和光大中國文化的光榮傳統，提倡愛書、讀書和用書的治學精神，都有其不可估量的意義。〔註32〕

筆者藉著對於明代私家藏書文化的高度興趣，早在碩士班求學時期，便已經萌生對於明代江南地區私家藏書文化的研究企圖。經過了多年的計畫與資料的收集，透過了一邊整理與一邊閱讀，對於明代江南地區的藏書文化以及文人生活方式，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並且興趣又更加的濃厚。遂以《明代的江南藏書——五府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為題，進行時代性與區域性的文人藏書生活文化的探究。

範圍的界定

首先，對於本文研究主題的地域範圍，必須詳加作一說明。如同題旨所示，本文是以明代的「江南五府」為題。先論「江南」，按照歷史地理的觀點，江南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域差別。廣義的江南，其區域範圍包括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而狹義的江南，則是指長江下游沿江南岸地區，包括現今的江蘇南部，從南京到蘇州地帶是其主要部份，而這一部份也是歷史上的吳語區，兼及安徽的一部份、江西的一部份和浙江西部的一部份。若是以文化地理的觀點，「江南」往往單指它的狹義區域而言。〔註33〕說得更清楚一點，「江南」的範圍，根據近年來大多數中外學者的一般傾向，大致上是指明代南直隸長江以南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倉等府州，加上浙江省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等府，以及安徽省的皖南諸府之總合，〔註34〕稱之為「江南」。江南地區，自唐、宋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化最

〔註30〕程煥文，〈中國圖書文化的演變及其意義〉（收入《中國圖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版），頁一。

〔註31〕《藏書四記》，頁三三五～三三六。

〔註32〕陳曙，〈論私家藏書〉，頁六八。

〔註33〕費振鍾，《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頁五。

〔註34〕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二

發達的地區，它的文獻記載可說是相當的豐富，對於研究所需要的資料來說，它比起中國其他任何地區，也都顯得特別地充足。然就明清時期的情況而言，江南地區的地域範圍，應限定在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杭州、嘉興和湖州八府，以及清代由蘇州府析出的太倉州這八府一州所組成的地區，而這一地區也稱為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註35〕

至於明代江南地區的界定，還一種說法，對於明代江南地區，描繪的相當清楚，即是明代的「江南」，應包括了南直隸十四府：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廬州、鳳陽、淮安、揚州、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四個州：廣德、徐州、滁州、和州；浙江布政使司十一府：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江西布政使司十三府：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陽、撫州、臨江、吉安、袁州、贛州、南安，而尤以前六府為主。整體而言，明代的江南地區，在地理範圍上屬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淮海地區和贛江流域。如按現在的省（市）級行政區劃，涉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四省一市。

〔註36〕

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對於江南地區的地域劃分，從事研究的學人們，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不過，在各家研究者的筆下，仍然可以釐劃出江南地區的大略輪廓，其範圍大致囊括：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甚至江西，小至僅有江蘇南部一隅（蘇、松、常、鎮四府）或太湖東南平原一角（蘇、松、嘉、湖四府）。介乎其中者，則有蘇、松、杭、嘉、湖五府說，蘇、松、常、杭、嘉、湖六府說，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說，蘇、松、常、鎮、寧、杭、嘉、湖、甬、紹十府說等等，不一而足。〔註37〕

其實，蘇、松、常、杭、嘉、湖，是圍繞著太湖沿岸的六個府，也是長江中下游的富庶區域，特別是從南宋以後，在經濟、商業與文化上的發展，都達到空前鼎盛的地步。〔註38〕元末明初時圍繞太湖沿岸的城市，包括浙西（杭州、嘉興、湖州、

月第一版），頁一。

〔註3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一五五〇～一八五〇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一九。

〔註36〕錢杭，《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版），頁一。

〔註37〕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初版），頁四一九。

〔註38〕有關明代江南的社會與經濟之研究論著成果目前頗多，可參見范金民等，〈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十年綜述〉（收入《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版），頁三六六～三九四；以及傅衣凌，《明代江

紹興等地)，以及所謂的吳地（吳江、松江、崑山、常熟、無錫等地）。〔註39〕由上看來，入明以後的太湖沿岸城市，應包含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六府地區。

正如前文所述，學者對於江南地區的範圍觀點上略有不同，而其不同便在於江南地區包括的府州縣等有所差異。即使抱持中間看法的學者，也有五府、六府、七府、八府、十府等說法。更麻煩的是，即使同稱八府者，〔註40〕對於八府的內涵也有所差別。而它們當中唯一比較沒有爭議者，便是抱持六府說者。〔註41〕有鑑於在古代的官方文書及私人著述中，常常是五府乃至七府連稱，而且遲至明代，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地區，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有著內在經濟聯繫和共同點的區域整體，〔註42〕加上學界對於六府之說看法也較一致，因此，本文便採用六府地區的說法，以做為觀察江南地區文人藏書生活文化的範圍界限。

關於明代江南六府的藏書研究，筆者於碩士階段業已完成蘇州部份，並已出版。〔註43〕因此，本文雖為碩士論文之延續與擴大研究，對於蘇州藏書部份將不再贅述，僅專以江南六府之其他地區——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等五府地區，做為研究對象的地域範疇。

至於在斷代的限制上，由於藏書活動乃是文人生活文化的一部份，往往與地域風俗、地域文人習性，以及地域文學傳統等等多方面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有所關聯，因此，斷不可能絕對地以改朝換代的政治因素而加以斷定時代界限。中國史上的朝代興亡，其年代易斷，但是歷史上一些跨越兩個朝代的人物，在某些研究領域上，的確是難以歸屬。所以，廣義的明代人，應包含卒於洪武年間的元末人和卒於清康熙年間的明代遺民，甚至是清朝所謂的貳臣，原先本來是明朝的大臣或封疆大吏者，

南市民經濟試探》（台北：谷風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初版）等專著，此不贅。

〔註39〕施纓姿，《元末明初太湖地區文人畫家群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六月），頁四。

〔註40〕見范金民，〈明代江南進士甲天下及其原因〉（《明史研究》，第五輯，一九九七年五月），頁一六三。范氏文中所稱八府，係指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杭州、嘉興和湖州八府。

〔註41〕見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收入《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八年五月初版），頁二三。係指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六府。一般而言，持此六府說法的研究者，都傾向於此六府地區。

〔註42〕王家範，〈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頁七四。

〔註43〕見拙著，《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二〇〇二年二月初版）。

其人之言行雖不足取，然於治明史者，則不可不加以探究。^{〔註44〕}本論文既以文化史的研究角度為出發點，為了保留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文化的因果連續關係，在斷代上的取捨上，乃是以明代為主，但也包括一小部份與明初有關的元末江南五府藏書家或藏書風氣，以及一小部份明末影響所及的清初江南五府藏書家或藏書風氣，以保持本地藏書文化在研究上的完整性與延承性。

此外，本文在學科範圍上也有所限制。由於歷代藏書文化的內容涵蓋過廣，本文乃是基於明代文人生活方式中的藏書文化史研究為主，對於其他藏書相關學科上的一些專業領域，如圖書館學、版本學、校讎學、文獻學……等等非關文人社會生活研究之命題，基本上將不列入本文研究的範圍之內，若有涉及之處，則不多作論述，以確立本文在生活史、文化史角度研究的專題性。

資料的處理

本文在資料的參考上，是以正史、明代文集、元明清筆記史料、明清地方志、明清書目與題跋，以及藏書學研究等資料為主要的蒐集對象；對於近人的論著上，一些有關明代的私人藏書活動、文人集團研究與文人生活文化等領域之成果，筆者皆一一閱讀過濾，並藉以做為撰文時觀念的啟發與參考的依據。

明人文集，在此是指集部中的別集類而言。明人別集是個人生命史的紀錄，也是同時代人物往來的生活史記載；當代人物活動的紀錄，本是歷史研究的範疇，也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史源之一。^{〔註45〕}在研究明代江南五府的藏書家時，往往可以藉由藏書家或其友人的文集，來發掘他們的藏書事蹟、心態觀念，以及藏書活動、藏書生活等等記載，文集在本研究上，對於資料的取得，的確頗有助益。

其次，明清地方志對於明代江南地區藏書家在人數的掌握上貢獻匪淺，許多藏書家的藏書事蹟，往往見之於方志。此外，一些已經亡佚的古籍，在方志上有時也能找到蛛絲馬跡，對於藏書家身份的證實，起著很大的作用，在風俗文化地域視野的敘述當中，地方志的作用絕不可忽視。地方志與正史不同之處，在於更多方面地反映社會生活，突出的記敘地域性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註46〕}而這些正是地方

〔註44〕 王德毅，《明人別名字號索引》（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〇年三月台一版），〈敘例〉，頁三。

〔註45〕 吳智和，《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收入《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初版），頁一三五。

〔註46〕 韓養民，〈中國風俗文化與地域視野〉（《歷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五期），頁九三。

志在社會生活史與文化史上的珍貴之處。

一般而言，所謂歷史藏書學，是研究歷史上中國藏書現象、藏書事業以及與之有關的學術活動的學問，它發端於十九世紀後期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編集之時，並且它是在前人長期的史實紀錄、史料編集和藏書經驗總結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以明代的藏書研究而論，元、明、清的筆記雜著、文集、方志、藝文志、經籍志、序跋、書目、藏書志與藏書記，以及明清以來學者編集的藏書史料等等，都是研究中國歷史藏書學的珍貴史料，〔註47〕也都分別有其研究上的參考價值。

此外，藏書學的研究，自然還得吸取多方面如中國書史、目錄學史、古代版本、分類、科學技術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註48〕而近人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專書部份，主要有：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註49〕、汪閏《明清蟬林輯傳》〔註50〕、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註51〕、楊立誠與金步瀛合著的《中國藏書家考略》〔註52〕、李玉安與陳傳藝合著的《中國藏書家辭典》〔註53〕、梁戰與郭群一合著的《歷代藏書家辭典》〔註54〕、任繼愈《中國藏書樓》〔註55〕、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註56〕、傅璇琮與謝灼華合著的《中國藏書通史》〔註57〕等等。至於期刊論文部份，主要有：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註58〕、項士元〈浙江藏書家考略〉〔註59〕、蔣復璁〈兩浙藏書家印章考〉〔註60〕、日人宮內美智子〈明代私家藏書考〉〔註61〕、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註62〕等等。凡此種種，都是

〔註47〕《藏書四記》，頁三三五。

〔註48〕徐雁，〈我國古代藏書實踐和藏書思想的歷史總結〉，頁六〇。

〔註49〕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註50〕汪閏，《明清蟬林輯傳》（九龍：中山圖書公司，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港初版）。

〔註51〕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註52〕楊立誠等，《中國藏書家考略》（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十月初版）。

〔註53〕李玉安等，《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版）。

〔註54〕梁戰等，《歷代藏書家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第一版）。

〔註55〕任繼愈，《中國藏書樓》（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第一版）。

〔註56〕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七月第一版）。

〔註57〕傅璇琮等，《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二月第一版）。

〔註58〕袁同禮，〈明代私家藏書概略〉（收入《清代藏書家考》，九龍：中山圖書公司，一九七三年一月初版），頁七三～八〇。

〔註59〕項士元，〈浙江藏書家攷略〉（《文瀾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三月），頁一六八九～一七二〇。

〔註60〕蔣復璁，〈兩浙藏書家印章考〉（《文瀾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三月），頁一七二一～一七四五。

〔註61〕日·宮內美智子，〈明代私家藏書考〉（《青葉学園短期大學紀要》，第四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頁一二一～一二六。

〔註62〕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〇